

历史在等待水声的回响 (二)

崔小红 杨道文 何金坤

“打响文化资源牌”之“淮南历史文化精英” (第十季)大型征文

石家湾与便硖段

寿唐关至店挖磨一段路基的精髓在石家湾,正式名称为凤台县李冲回族乡石湾村。它是1983年淮河便硖段退堤工程的产物,由淮河左岸河滩地搬迁到淮河右岸的山坡上。

1982年与1983年,淮河流域接连发生大洪水,尤其是1983年的洪水,淮河三次出现洪峰,凤台县最高水位达32米多,全县22万亩农作物被淹,河滩里的石湾老村民房损坏严重。

峡山口以上的河道旧堤防体系已无法承受淮河洪峰,1983年冬,水利部门正式启动便硖段退堤工程。“便”指东风湖向淮河排水的通道便民沟,“硖”指硖山口。便硖段退堤工程是淮中游治理从“人水争地”转向“人水共生”的关键。通过退堤来扩大河道行洪断面,用物理空间的撤退,换取了防洪安全的战略纵深。

如今的石家湾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被广泛认同背景下的石家湾。它毗邻茅仙洞,紧靠寿唐关,背靠八公山,面向淮河水,寿唐古道穿境而过。春天这儿十里桃花,村里充满人气,是一座活力四射的村庄。冬天,梅花雪阵阵,厨房里飘出馍馍的香味,人们听着松涛入眠。

东风湖原名董奉湖

便硖段退堤工程解决的是居住安全问题,而非土地所有权问题。石湾村从左岸低洼地搬迁至右岸高地后,原有的耕地还在淮河左岸的东风湖里。

东风湖的名字确定于1958年。是年,东风湖农场建立,取“东风压倒西风”之意。这本是曹雪芹写在《红楼梦》里的,把它变成时代口号的则是毛泽东。

东风湖原名董奉湖,源于东汉时期

建安三神医之一的董奉。传说他曾在此隐居行医,栽种杏林,故此有董奉岗,湖因岗得名。这是带有医者仁心印记的古老地名。

在凤台县,董奉已经不再是福建的那个古人,而是董岗村里一个永生的医神。董奉湖一名则是献给这位悬壶济世医神的最朴素感恩。董奉的精神内核与治淮精神有潜在的共鸣,他的济世情怀与治淮中的奉献精神异曲同工。

汪胡桢与淮河大堤

不论是1949年前的治淮,还是新中国建立后的治淮,都绕不开一位中国近现代水利史上的关键人物——汪胡桢。民国六年(1917年),汪胡桢毕业于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特科,是近代中国独立培养的第一批水利人才。汪胡桢在河海读书时,应老师李仪祉的要求,将Reservoir译为“水库”,被采纳,应用至今已逾百年。民国十三年(1924年),汪胡桢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

中国近现代水利史上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与汪胡桢有关。他是同时得到海峡两岸高度评价的水利科学家。民国二十年(1931年),江淮流域爆发特大洪水,全国设十八个灾区工赈局。汪胡桢任皖淮工赈第十二局局长,来安徽举办工赈,负责正阳关至五河县约140千米长度的淮河筑新堤或修旧堤任务。汪胡桢画下蓝图,淮河儿女计算土方,10万先垦夯下一层层土壤,奠定了今天淮河大堤的实体基础。本次大规模、系统性应用了现代水利工程技术,树立起技术范本,对后世治水产生长远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汪胡桢主持制定《治淮方略》,为淮河治理绘制百年蓝图。他设计并指挥建设了佛子岭水库连拱坝,如长虹一道,已陪伴青山70余年,至今还在发挥作用。这位浙江嘉兴人因全力投身于安徽的治淮工程,常被视作与安徽密切相关的标志性科学家。

历史中的每一代人,都曾在他们的局限里,为“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这片土地付出过真实的努力。这些付出,带着时光的芬芳。

寿唐关

在淮河右岸石家湾以北约800米处,有一道古关隘,名曰寿唐关。“寿”字用在关隘上,取“江山永固、万寿无疆”的政治寓意。“唐”指南唐(937—975年),正是那个与后周(柴荣、赵匡胤)反复争夺淮河防线的地方割据政权。今天的淮南地区曾是南唐抵御中原的北部核心疆域。“关”即关隘。寿唐关位于东楼山与西楼山之间的山口,这里是八公山余脉的一道天然裂隙。关口建在垭口最低处,卡在南北向的寿唐古道上,南经寿州,北控下蔡,带有扼守咽喉的地缘特征。

南唐保大十五年(后周显德四年,957年),周世宗柴荣挥师南下,攻取南唐。赵匡胤作为先锋将领之一,直奔寿州(今寿县),却被困于寿州城中。故事说,赵匡胤派外甥高琼带领亲兵杀出寿州城,前往开封撤救兵,途经蒙城双锁山时被占山为王的刘金定招夫。翌日,刘金定与高琼清点山寨里五营四哨的喽啰驰援寿州,率先攻占了寿州城北的寿唐关。刘金定在此梳妆扮甲,跨马提刀,率兵力斩寿州四门。兵困南唐的赵匡胤,终于得解重围。此役后,寿唐关得别名梳妆台。后赵匡胤班师经此,寿唐关又被称为过驾楼。

如今刀光剑影已消逝,唯余淮水长流,青山依旧,还有寿唐关的青砖拱门在低语那些烽火与传奇。

马扒泉·大救驾

赵匡胤得解重围后,人马又被南唐援兵困在八公山里,粮草被截,人困马乏。一天,一匹战马挣脱缰绳,奔到一丛草边用蹄蹄扒扒地面,扒着扒着,一股清水淌出来。该泉眼被后人名为马扒泉,位于寿唐关东南约2千米处,在驴蹄山脚下。

马扒泉,驴蹄山,这些大白话名字粗陋如淮南的土地,完全是农家视角命名逻辑的产物,成为地方历史传承的载体。

饥肠辘辘的兵士们松开缰绳,任由马匹四处寻食。只见一些马匹去刨食一种藤秧植物,这些植物的块状根茎被扯

出来,马儿也啃食。将士们拾起这些块状根茎尝了尝,能充饥,这就是芋头。从那以后,芋头被民间大量种植。许多风物走进生活,并非来自庙堂设计,而是普通人在极端状态下对自然资源的重新发现与定义。换言之,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

伙头军用芋头等食材制作糕饼,将士们得以续命,最终战败南唐守军。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后,感念此糕饼的救命之恩,赐名“大救驾”。大救驾现在的配方为猪油、芋头、小麦粉、冰糖等,高油高糖,总是离不开战时应急属性,这也是全世界战备食物的特性。

茅仙洞

如果说八公山是生存战场,那么茅仙洞就是精神避难所。茅仙洞在寿唐关正西直线距离约800米处,位于三峰山之阳的峭壁上,南临淮水,被誉为皖北第一人文洞府。茅仙洞有2100多年的历史。西汉时,陕西咸阳的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辞官渡淮,在此洞中采药炼丹、修炼成仙。当地百姓称此洞为茅仙洞。

汉代是道教孕育期,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聚集方士炼丹,著书《淮南子》,将淮南地区打造成当时重要的神仙文化策源地。三茅在此氛围中建立清天观,成为修炼洞府。唐皇室尊老子为祖,但佛教因武则天时期的政治和社会融合需要而达到鼎盛。天下名山僧占多,灵秀之地茅仙洞被高僧中建寺。这是唐代佛教扩张与道教争夺洞天福地的缩影。茅仙洞的独特在于它并非单一教派的道场,而是佛道共存。它的每一次易主,都精准踩中了中国意识形态变迁的步点。这儿简直是一部用香火和寒武纪的石头写就的微观宗教史。

在当地农家视角里,教义之争并不重要,只要有求必应就行。于是,处于肥水三湾第一湾怀抱中的茅仙洞便形成了洞内供三茅真君、洞外有寺院的佛道共存局面。每年农历二月十九的庙会才是淮上盛事,百姓用虔诚融合文化生态,茅仙洞成为中国民间宗教的现实样本。

田家庵老北头趣闻轶事

1951年的田家庵,只是一个“人不过八千、方不过二里”的小镇。1953年5月撤镇建区,一个月后开展第一次人口普查,人口已增至3.5万人。到了10年后的1961年,人口已增至18万人,年均增速约36%。这是田家庵历史上人口增速最快的10年,远超后续任何时期,也远超千里淮河的其他城镇。

人口增长如此之快,既是从镇到区的行政升级,也离不开淮南建设华东煤电基地——全市大规模招工超过20万人,苏、鲁、豫、沪等地的人拖家带口大量迁入。当然自然增长也很旺盛,家家孩子大多是“连根出生”,这个刚断奶,那个就急不可耐地待产,哪一家都有四五个孩子,七八个的也不稀奇。

如今六七十岁的“资深帅哥美女”,大都是那个年代从母亲痛苦的挣扎中,哇哇大哭着来到淮河边的这座新城。迎接他们的是充满希望的世界,也要接受那个时代风雨的洗礼。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是我从幼时吃吃喝喝的感受中悟出的。

“物以稀为贵。”这话用在“人”这个万物之灵身上,有些不够恭敬和文明。但人有多好干活、人少好吃馍,却是现实存在。尤其在那个贫穷落后、越穷越生的年代,一张张大小嘴都要吃吃喝喝,孩子没那么金贵。还有大人说:“孩子长大了不愁没好的吃,先让干活的吃饱好挣钱。”家中好吃的,首先要紧着劳动力(父亲或爷爷)先吃,过后孩子往嘴里扒,奶奶和母亲是最后舔碗。活着是硬道理,生存比斯文管饭。

爷爷要等到开工资那天,才难得买一个卤兔子头回家,将卤兔子头往桌上一放,举起小酒盅自斟自饮。昏暗的小屋里,煤油灯光在风中摇曳,忽明忽暗地将他斑驳陆离的剪影投在墙上。遇到节日或家中来客,爷爷会买些卤菜,我和弟弟如小兔子一样活蹦乱跳,吃几小块肉,嗦着油乎乎的小手,眼巴巴地望着油灯下的盘子。两个姐姐从来不上桌,为两个弟弟空出位子,此时克制着对美味的欲望,心口不一地说着不喜欢吃肉。在难以饱腹的日子里,她们用“孔融让梨”般的美德,饿着肚子演绎“敬老爱幼”的答案。

三年困难时期,母亲想方设法去找些菜帮、菜叶、麦麸、议价粮等,奶奶则精打细算,给家里碗柜加了锁,防止我们偷吃。但是“家贼难防”,我有一次偷吃了未烧熟的食物,结果得了伤寒住院。生病能吃些好的,我感到很幸运,虽未管饱,也解了小馋。

为度过困难,家中奶奶、母亲和姐姐齐上阵,在现在龙湖公园的东南角(当时是荒地)种了麦子,大家挑水浇粪忙乎了半年。到收获时节,希望再成熟一些再割晒。几天后一看,麦子已被别人偷走了。从冬到夏的辛勤劳动,换来颗粒无收的下场。真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贼偷粮,全都白辛苦”。

两个姐姐带我劳动挣钱的第一课,是步行八九里路到田东的淮南肉类加工厂,批发冰棒装在小木箱里,沿街叫卖:“牛奶冰棒,五分钱一根;盐糖冰棒,三分钱一根……”两个姐姐喊累了,我接着用稚嫩的童音学着喊。每个冰棒有三到五厘钱的差价,一箱冰棒不到几角钱收益,但也可贴补家用。如火的太阳,炙烤的路面,上晒下烤,十多岁的两个姐姐照顾我,拿一个盐糖冰棒让我消暑先吃。待我将有些许红糖的冰棒吸吮得只剩残白冰块时,两个姐姐仍然你推我让,各自浅尝一口又递给了我。

后来两个姐姐先后利用寒暑假,到

建筑工地挑泥斗、搬砖做小工,脸晒黑了,手磨烂了,大人们也心疼。但是能找到挣钱的机会,高兴还来不及,多挣多得、少挣少得、不挣不得,按劳分配,好吃懒做没人搭理你。

别人家的孩子也没闲着,个个都是家中的帮手。家长是搬运工,孩子总在后面推车;家里是打铁的,孩子就帮着抡大锤;磨豆腐的作坊里,推石磨是男孩子练胸肌的功课。女孩子拆棉纱、糊纸盒,还打毛线,织线衣线裤,比做作业还忙活。

春天的堤坝下,你争我抢挖野菜;夏天的西瓜摊前,端着脸盆接瓜籽;秋天的田地里,挎着篮子拾庄稼;冬天的马路上,拉着板车运煤球。这些都是孩子们的“功课”。到了星期天,田家庵电厂的排水沟里,男男女女的孩子,你追我赶弯着腰捡煤渣,谁也舍不得伸起腰来偷偷懒。《红灯记》里唱的:“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家里大人吸烟,孩子们也是帮手,大多在马路边捡烟头,增多粥少,事倍功半。聪明的等散电影时,趁着人群往外走时钻进电影院,能帮你烟头小丰收。大人回家接过烟丝,住往心疼孩子又表面发火,卷起烟卷猛吸一口,在烟雾的氲氲里,苦中有乐,爱意满满。

我劳动的发蒙,从七八岁开始。放学回家接过奶奶交给的篮子,走向劳动的第二课堂——到柴禾行(háng)周边去拾麦草、柴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多数是草房,柴禾行的高粱秆子、芦苇秆、麦秸草、稻草等是建材。沿途拉车送货总会撒下一些,我就沿路将散落地上的麦秸、稻草等拾到篮子里,到家时一副凯旋而归的样子。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地下的蚂蚱、空中的蜻蜓、河里的小鱼都是我们捕获的对象。夜晚路灯洒下橘黄暖色,灰色的蟋蟀和黑色的“油葫芦”流萤般飞舞,我们举着鞋底或小手,从天而降将其捕获,喂食家里养的小鸡、小鸭。大人的赞赏、鸡鸭抢吃的兴奋劲儿,就是对劳动成果的嘉奖。

到了1968年,国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老北头的中学生几乎全都下放农村。我两个姐姐第一批下放,优先安置在周边郊区。那时城里是旱厕,生产队各包一个厕所,搭个茅草庵专人看管大粪别被偷了,每个星期生产队安排挑粪种田。说来也巧,我们家旁边的旱厕,就是二姐生产队的包点。二姐肩膀上披着垫褥,一根扁担两个粪桶,要挑五六里路到农村。什么臭味、汗味,什么面子、形象,都抵不上社会的需要与生活的碾压。大姐下放的农村,挣的工分都换算成芋头和胡萝卜,一板车拉回家,让家中一天三顿胡萝卜,吃得嘴里直冒酸水。我曾经到大姐的生产队,招待我的就一个炒红萝卜,加了不少油,仅此而已。可想她们平时的窘迫与艰难。那岁月伴随着眼泪、惆怅,更有坚强、忍耐,两个姐姐早已不是温室娇女,都成了战天斗地的“铁姑娘”。

没到下放年龄的孩子,学校办起了校办工厂,组织“勤工俭学”。学生与学徒,身份相互交换;课堂与车间,实现无缝对接。孩子们一手拿笔,一手握锤,共产主义的接班人,通过劳动的必修课,从少年时就培养了用双手改变世界的优良品质。

现在回想起来,那代穷人的孩子,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着更深刻的感悟;忧患使人勤奋而得生,安乐使人怠惰而萎靡。

抚平时间年轮的褶皱,便拥有了俯视岁月沧桑的视角。古稀之年的“资深帅哥美女”,胡子里满是故事,银发中飘逸风情,将“苦难是人生宝贵财富”刻在了骨子里。在追寻夕阳绚烂的晚霞里,或同学聚会,或结伴旅游,从心里蹦出来的都是苦中自乐的画卷。



焦岗湖绿野仙踪

沈道银摄

“焕然一新”的淮夷文化与州来建国

周 强

天禧寺新建法堂记》、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杨万里《赠直秘阁彭公行状》均用作“焕然一新”。当淮夷文化面貌发展到“焕然一新”的程度后,淮夷方国州来国便应运而生。

州来国在史书上首次出现是在公元前584年“吴人州来”,而其建国时间则应上推至西周初期。前引王迅的著作中说到“纣克东夷”和“周公东征”两大历史事件。商朝与东夷关系一直友好,直至商朝第29任国君帝乙和末代商王帝辛(纣王)才与东夷发生战争,结果不仅使东夷与商朝关系恶化,也使商朝国力遭到严重削弱。崛起于西方的周武王趁机出兵,完成商周鼎革,《左传》谓之“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另据《史记·周本纪》,西周王朝建立后,与东夷关系更不友好。周武王去世后,东夷追随纣子武庚与“三监”发动大规模叛乱,“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周公伐纣三年,方将叛乱平定。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山东半岛流入渤海的潍河古称潍水,又称淮水,分布在潍水流域的东夷族群是最早的淮夷。周公东征淮夷后,淮夷原居地被齐、

鲁等国侵占,部分淮夷部落只得南迁至现在的淮河流域,称南淮夷,新家园的河流亦称淮水,留居潍水故地的部落则称东淮夷。王迅则认为,“淮夷在今安徽江淮地区活动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夏商时期”的英、六、巢等国。我们可以视前者为南迁淮夷,后者为土著淮夷,州来则是南迁淮夷和土著淮夷融合而产生的国度。

关于州来国族属,熊伟《先秦古国志》(华文出版社)认为“州来是山东的州国南迁所建”;沈国冰《州来为什么不是凤台?州来、下蔡、寿春有什么渊源》认为,州来是“莱夷中的一支莱人”南迁后,“与当地部族深度融合,在商周交替之际,于淮水中游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其实两者说法并不冲突,州国居今山东省中部安丘市,紧邻莱夷故地,州来族属无论是州国还是莱夷,都属南迁淮夷。

州来不是西周王室分封,因此没有爵位。其姓氏有姬姓、嬴姓两种说法:《春秋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附“春秋124国爵姓·有姓无爵者17国”中有姬姓淮国,因为淮夷经常参与楚国主导的

诸侯会盟,因此编著者将其视为一方诸侯。淮为姬姓,州来属淮夷方国,亦应视为姬姓。但《路史·国名纪乙》则将州来列入“少昊后嬴姓国”之中。

州来还有几个别名: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辞书《尔雅·释丘》说“淮南有州黎丘”;西汉《盐铁论·论儒篇》将州黎丘简化为“黎丘”;《中国都城辞典》将州黎丘简化为“州黎”;曲英杰《水经注城邑考》根据古音古义演变推断认为,“寿春与州来同义”;上博简《吴命》中有“来”字,学者或释读为“州来”,或释读为“寿来”。

关于州来国地域,其东有钟离国,建都今凤阳县板桥镇钟离古城遗址;西有蓼国,建都今河南固始县境内;南有六国,建都今六安市区;北有胡国,建都今阜阳市区。由此而推,州来国领地大致以今寿县、凤台两座县城为中心,延及淮南市以及颍上、霍邱、长丰等毗邻地区。州来又名“州黎”,其东方邻国钟离又名“终黎”,“黎”有“众多”的意义,两个淮夷方国都带“黎”字,其国名意义是否与“黎民”众多、“黎庶”稠密有关,值得探讨。

典说淮南历史 第一季

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将安徽江淮地区西周、春秋时期的文化遗存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西周早期,第二期西周中期,第三期西周晚期,第四期西周春秋早中期。第一期西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现有来自山东地区具有东夷文化传统的陶器,“可能是商末周初在纣克东夷、周公东征等战争中,部分东夷人被迫南迁带入安徽江淮地区的,当地的淮夷文化的特征由此增强。中央王朝的更迭,使当地的淮夷文化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由商文化因素变为周文化因素,文化面貌焕然一新”。

“焕然一新”源出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其有晋宋名迹,焕然如新,已历数百年,纸素彩色未甚败。”宋李之仪《姑溪居士文集·



茶馆书香

童良桐摄